

# 转喻的概念本质及其语用学意义\*

李勇忠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7)

**摘要:**传统修辞学把转喻关系看成是真实世界的“邻近”关系,而 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则把它看成是概念层面上的邻近关系。转喻是在同一认知框架下一实体(源域)为另一实体(目标域)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操作。本文从转喻的概念本质出发,分析了转喻与言语行为、转喻与认知距离等的关系。进而分析了转喻的语用学意义,诸如新格氏理论与转喻推理图式在语用推理中的互补性及转喻与含义和显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转喻;认知框架;突显;语用推理

**Abstract:** Traditional rhetoric treats metonymic relation as a kind of contiguity in physical world, while Lakoff and other cognitive linguists treat it as contiguity in conceptual world. Metonymy operates within the same cognitive frame in which one entity, the source, provides mental access to another entity, the targe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ual nature of metonym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tonymy and speech act, metonymy and cognitive distance, etc. It further analyzes various topics concerned about the pragmatic significance of metonymy, such as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Neo-Gricean theory and metonymic schema in pragmatic inferenc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tonymy and implicature, metonymy and explicature.

**Key words:** metonymy, cognitive frame, highlight, pragmatic inference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6038(2005)08 - 0001 - 04

## 1. 关于转喻的定义

转喻,亦即借代,是传统修辞研究的重要辞格之一,但作为一种概念现象,最先却是由 Lakoff和 Johnson在他们合作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一书中提出的。转喻被认为主要用于间接指称,如:用 the Crown借代 the monarch,换言之,转喻所表示的是一个实体与另一实体之间的“代表”(stand for)关系。Lakoff(1987)后来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来进一步阐释他的认知观点。ICM是表征交际者概念及语义知识的认知结构,ICM可细分为4种类型:意象图式、命题模型、隐喻模型及转喻模型。其中转喻模型是产生类典型效应(prototype effects)的基础。例如,Lakoff注意到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一般会把 mother与 housewife mother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会把常年呆在家、任劳任怨地做家务事、抚养子女的母亲看成是母亲的典型代表。上位词 mother与下位词 housewife mother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转喻关系。

Lakoff把隐喻看成是发生在两个不同认知域(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同构映射(isomorphic mapping),而转喻则是发生在同一概念域内部的突显。传统修辞学把转喻看成是真实世界的“邻近”,而 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则把转喻看成是概念层面上的“邻近”。

转喻常被看作是一种指称现象,表示的是代表关系。但

是,我们认为代表关系,即替代关系(substitution),不足以概括转喻运作的全部。除了某些词汇的历时语义演变外,转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一种认知操作的过程。最近的转喻研究表明,转喻应该被看作是理解目标概念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触点(cognitive trigger)。Radden & Kövecses (1999: 21)给转喻下了一个广为学界认可的定义:转喻是发生在同一认知模型中的认知操作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mental access)。

## 2 转喻的本质

转喻图式“X FOR Y”字面上表达的是一种替代关系,在以下的行文中我们依然沿用这一图式,原因有二:其一是出于简明,其二是遵守认知语言学约定俗成的做法。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转喻的本质。

### 2.1 转喻是一种偶然关系

Radden & Kövecses的转喻定义是基于 Lakoff(1987)和 Langacker(1993)的观点: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无疑,他们的定义把转喻从传统的修辞观中拯救了出来,同隐喻一样,转喻不只是语言的修饰,它更是一种认知手段。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的定义有“大而全”之嫌,该定义无法把非转喻的表达与转喻区分开来。请看例句:

(1) The piano is in a bad mood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认知语用学与外语教学的创新研究”,批准号:EB030496。

作者简介:李勇忠(1969-),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用学

收稿日期:2005-04-21(修改稿)

(2) The loss of my wallet put me in a bad mood

例(1)中 the piano 很显然是转喻指称弹钢琴的人,“钢琴”为“弹钢琴的人”提供了心理通道。例(2)中概念实体 the loss of my wallet 同样为概念“non-possession (of the wallet)”提供了心理通道。那么例(2)的“丢了钱包”与“不拥有钱包”是否与例(1)中“钢琴”与“弹钢琴的人”属同样的转喻关系呢?我们认为不是。从概念上来说,“丢”是“不拥有”的必要条件,亦即:“我在某时(t)丢了钱包”预设(presuppose)“我从某时(t)开始,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拥有这个钱包”。但“钢琴”与“钢琴手”之间不是必要关系,而是偶然关系,“有一架钢琴”并不预设“有一个钢琴手”,钢琴与钢琴手不一定同现,它们之间是一种偶然。这就是说,LOSS FOR NON-POSSESSION 不是转喻,而 MUSICAL INSTRUMENT FOR MUSICIAN 却是常见的转喻。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转喻表达的是一种偶然关系(或非本质关系)(contingent relation),在大多数情形下,转喻依赖语境。

## 2.2 转喻与言语行为

转喻模型的提出表明转喻不只是发生在指称层面。从语用的角度来看,转喻同样存在于述谓、命题及言语行为层面。如:

(3) General Motors had to stop production

(4) a I would like you to close that window.

b Close the window.

例(3)包含了一个命题转喻,General Motors 转喻指代该公司的行政官员。同时它又包含了一个述谓转喻“必须或有义务停产”转喻代指停产这一真实发生的事件,遵循概念转喻“OBLIGATION TO ACT FOR ACTION”(行动的义务代行动)。这一概念转喻是由高层概念原理生成的:潜在事件(如做某事的能力、可能性、许可、义务)与事件的真实发生之间存在着转喻关系。事件被概念化为理想化认知模型,包含了作为子成分的事件实现的时态和情态。

例(4)则是一个言语行为转喻,a句转喻唤起(evoke)一个请求b。言语行为转喻的基本思想是:言语行为的某一属性可以借代整个言语行为,正如我们常会用人的一属性借代整个人一样,如“秃子”、“胖子”、“眼镜子”等。

## 2.3 认知距离与转喻力

转喻的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借代关系在力量方面是不同的。其转喻力的大小取决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概念的接近程度。例如:

(5) a There's a draft in here

b Close that window.

显然,此例两句的转喻力要比例(4)两句的转喻力弱,例(4)a是说话者直接发出的请求,而例(5)a则是说话者陈述事实。也就是说,(4)a与(4)b的认知距离要比(5)a与(5)b的距离短,因而转喻借代的可能性大。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在大多数语境下,例(5)a表达的正是一种请求或命令:把窗户关上,或者说b是a的会话含义。

我们可以设计出一条转喻链来描述以上的认知操作过程:

P 不希望(P) 希望(不是P) 致使(Q,不是P)  
执行(Q)

P代表例(5)a的命题内容,Q代表b的内容。

关于转喻力与认知距离的关系,石毓智先生(2000:63)用“V+”的结构作了生动描述。他指出:事物越抽象,其离散性就越弱,相应地用“的”指代起来也就越困难。如,说“开车的”,我们常规性地指“开车的人”,而不指代“开车的技术”,故我们不说“他已经掌握了开车的(技术)”。认知距离对转喻指代有影响。“V+”的结构最容易指代与行为动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施事、受事,要是没有确切的上下文,我们一般不会用它来指代工具、地点等,因为它们与行为的认知距离较大。比如“吃的”,最有可能是指有关人或食品,不大容易理解为与吃有关的刀、地方等。正如“壶开了”(The kettle is boiling),凭直觉,我们很快就能辨认出是“壶里的水开了”。因为“壶”与“水”构成了常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稳固的、恒常的,一说到“壶开了”,作为与“壶”构成邻近关系的“水”马上就被激活了。如果是油在壶里加热,我们一般不说“壶开了”,因为壶与油不构成常规关系,换言之,壶与油的关系不如壶与水之间紧密,亦即,两者的认知距离比水与壶的认知距离远,因而被转喻借代的可能性要小。

## 2.4 转喻的普通性

认知语言学与传统修辞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认为转喻与隐喻不只是语言表达的饰物,它们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认知机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转喻不仅是语言意义(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语言运用(语用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对象。实际上,因为转喻的存在,要想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划上一条明显的界线已经不可能了。日常语言充斥着转喻。“突显的部分代全部”已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势,帮助我们经济简约地把握和认识世界。“长颈鹿”是以长长的脖子得名的,“红胸鸟”(redbreast)以红红的胸而著称。红胸鸟还有个学名“欧鸫”,但记得的人恐怕只有鸟学专家了。以外显特征来命名的还有,鸟类:yellowbeak, purplehead, bluetail等;形容人的有:potbelly(大肚子),balloon-nose, fatface, skinnylegs,等等。

## 3 转喻与认知框架

沈家煊(1999)指出,认知框架是人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对人们来说,各种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常见的认知框架有:容器—内容,如壶与壶中的水;整体—组成部分,如人与脸;当事—行为/经历,如他失败了;施事—(工具)—动作—受事/结果,如小王用脚踢开门;施事—动作—与事/目标—受事,如李响送妈妈一张贺年卡。

认知框架与理想化认知模型同为重要的认知手段,在语言的理解和生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框架语义学的代表人物菲尔墨(Fillmore)认为,框架由一系列相关的范畴组成,其结构根植于生成话语的语境。词语的意义由说话者的脚本经验及话语预设的社会机制所决定。不考虑整体框架,就无从建构词语所表达的确切意义。如不考虑框架“星期”,便无从理解“星期二”,无法确定它是指一周开始后的第三天(参见李勇忠、李春华,2004)。框架内诸成分密切相关,由于邻近性而彼此构成转喻关系。突显(highlight)在意义的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语用者会根据交际需要突出框架内的某

一语义成分。选取什么样的框架是由识解 (construal) 决定, 取决于说话者如何把自己的经验概念化 (conceptualize), 以达成交际, 便于听者理解 (Croft & Cruse, 2004)。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感知和认识世界时常会选择—个特定的透视域, 只有进入到透视域的事物才会在认知层面上突显出来, 然后经过认知过滤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突显与基体 (profile / base) 是意义生成的一对基本范畴。例如, land 与 ground 是一对近义词, 基体相同, 都是指同一概念内容, 但两词突显的内容不同。Land 指称的是地球干燥的表面, 与 sea 相对, 而 ground 则是与 air 相对的。菲尔墨指出突显不同, 语义推导也不同, 如 The bird spends its life on land 和 The bird spends its life on the ground 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指这种鸟只生活在陆地不生活在水中, 后者则指它们只在地面行走不能在空中飞翔。Langacker (1987: 164) 也举了两词来说明, roe 和 caviar, 两词均指鱼卵, 但突显的内容不同。前者突显的语义成分为繁殖系统, 而后者则突显食品。

转喻的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认知域内的成分突显。如果说隐喻是两个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 那么转喻则是在同一认知域内的矩阵域 (domain matrix) 与次域 (sub-domain) 之间的映射, 亦即矩阵域与次域之间的突显。一定的认知框架内以显著的东西转喻借指不显著的东西是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知名大报 *Herald Sun* 在 2005 年元旦发表了一则报道, 题为 “Candles Replace New-year Fireworks”, 现摘录导语如下:

A world grieving for the more than 125, 000 dead in Asia's tsunami catastrophe marked a somber passage to the New Year with the traditionally exuberant celebrations eclipsed by mourning, and remembrance candles often replacing fireworks

很显然, 标题运用了转喻。“蜡烛”可以激活矩阵域“悼念活动”, “烟花”可以激活矩阵域“庆祝活动”。换言之, “蜡烛”和“烟花”分别是两个认知域中最突显的成分。在“海啸”袭击亚洲部分地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黑暗日子里, 这则新闻无疑是该报的头版, 作者借助转喻, 简明扼要地借助标题传递了整条新闻的信息, 吸人眼球, 最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新闻报道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请看以下两例:

(6) 已有 20 万上海人通过普通话测试, 公共场所不再“阿拉”“阿拉”。

——上海《新闻晚报》(2003 年 9 月 17 日)

(7) 在中国盖第一高楼, 日本投资方不担心“9-11”。

——《南方都市报》(2003 年 2 月 16 日)

“阿拉”是上海话中最显著的特点, 此处用“阿拉”代上海话, “9-11”是令美国乃至世界没齿难忘的悲惨日子, 于是“9-11”也成了恐怖活动的代名词, 符合部分代整体的认知规律。

#### 4 转喻的语用学意义

认知语言学与当代语用学的一个主要理论目标就是要模拟和阐释人类对话语的理解和意义的推导, 认知与语用是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 对认知和语用进行人为的分割, 只会导致片面地理解语言。

说到转喻的语用学意义, 首先要谈的当推语用推理了。

人类最常见的推理方式莫过于逻辑和经验。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方式, 语用推理往往不同于纯逻辑推理, 它是基于逻辑知识及个人经验的“临时推理”及“缺损推理” (default inference), 很大程度上来说, 它更多表现为逆证推理 (abductive inference), 亦即, 借助结论和大前提推导出小前提。转喻影响和制约着人们思维及行动, 转喻在语用推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知识结构酷似一张张由各种不同认知域构成的网络体系, 由一个个知识节点 (node) 串联而成, 任何一个节点的激活都可影响到与它关联紧密的节点, 从而像电流一样迅速唤醒 (invoke) 相关的知识。这一设想得到了认知心理学家 Collins & Loftus 的“激活扩散模型” (Spreading and Activation Model) 的支持 (参见李勇忠, 2004: 16)。知识节点之间由于彼此的邻近而构成了转喻关系,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 转喻是自然的推理图式, 利用转喻图式有助于听者更好地领会话语的含义。

#### 4.1 转喻与含义 (implicature)

古典格赖斯以及新格赖斯学派无不把会话含义的研究放在首位。实际上, Lakoff 的转喻模型与 Levinson (2000: 37) 提出的“信息启示原则” (Heuristic) 有异曲同工之妙。Levinson 认为词语往往蕴含着常规语用含义, 即缺损义 (default meaning), “简说的只表达常规含义”。Levinson 把他的理论与格氏的会话合作理论的量原则的第二条则联系起来: “不要说超过交际需要的多余的话”。黄衍 (Y. Huang, 1991: 306) 有更详细的论述, 他把“方式原则”细分为说话人编码准则和听话人推理准则两部分:

说话人编码准则: 不要无端采用冗长的有标记表达式;

听话人推理准则: 倘若说话人采用了冗长的有标记表达式, 他的意思不同于采用无标记表达式, 具体地说, 他是在设法避免无标记表达式的常规联想和信息量含义。例如:

(8) I need a drink

(9) I need a drink, but no alcohol, please

例 (8) 表达的意思是“我要喝酒”, drink 的常规含义是 alcoholic beverage, 这符合“简说的则表达常规意义”的信息原则。根据语用含义的可取消性, (9) 增加了取消 drink 常规含义的成分, 因而例 (9) 所表达的意思改变了。

可取消性同样存在于 Lakoff 讨论的转喻性激活的常规意义中。在言语交际中, mother 常激活其常规义 housewife mother, 但两词的转喻联系同样可以通过附加成分取消, 而不会造成误解, 如:

(10) She is a mother of two daughters but she is not a housewife

认知语言学认为, 意义通常是指通过转喻原理激活的常规关系 (Radden & Kövecses 1999: 27)。而新格赖斯主义认为, 意义是通过一般会话含义推导而来。简说的就是常规的, 这也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日常交际中,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 “上月我买车了”, 在当今轿车进入家庭的热潮下, “买车”很容易就激活“买轿车”的常规意义, 但这种意义是可以由附加成分取消的, 如: “上月我买车了, 是老牌凤凰自行车。”

新格赖斯理论与认知语言学有很多相通之处, 但双方缺少对话, 我们有理由预见,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是语言学界研

究的下一个热点。

#### 4.2 转喻与显义 (explicature)

新格氏理论以及关联理论的追随者,有不少对认知语言学的转喻和隐喻观提出了批评。Papafraou 和 Song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转喻和其他修辞格一样都可以纳入到语用推理(演绎推理)的基本框架之下,故没有必要再提出独立的转喻推理模式。Papafraou (1996)对转喻的认知“联结主义”(associationist)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描写和解释层面上都不足以概括转喻的本质,因为它对于创造性的新奇转喻(ad hoc metonymy)缺乏阐释力。故我们不应该赋予转喻特别的地位,它只不过是一种显义罢了,它属于语用推理,亦即它是由潜隐的语义内容转义为明晰的话语而已。但大多数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话语意义的获得需要激活大脑里长时记忆中的转喻关系网(metonymic relations)(参见 Panther and Thornburg, 2003: 9)。人们之所以能快捷而准确地推导出话语的深层含义,都是转喻使然。在一定的程度上说,转喻推理图式比之传统的语用学上的会话含义推导更能有效地说明人类大脑的认知操作过程。

#### 4.3 转喻推理图式

图式理论是关于背景知识的基本理论,图式是包括一切关于人、物、事件的抽象的知识结构。在人脑中以长时记忆的方式储存着不同层次的知识结构,当一个符号或一组文字输入时,相关的图式会被激活。图式内各成分之间以转喻的方式构成一张相互关联的网。语用者可以根据交际需要,选择某一个节点从而激活与之相关的部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转喻的使用实际上是一种语用策略。如:

(11) 布什要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进攻。

(12) 刚开始,爱人小于也有意见。一是孩子小,一到周末本想喘口气,黄小毛就去打麻将了,每次不仅没有进项,反而还要失去一些。小于有意见很正常。后来黄小毛就给小于做思想工作,讲这是一种变相投资,等以后整出头来了,别人就开始往他身上投资了。反过来正过来讲,头发很长的小于终于听明白了,为了将来,她把不满埋在了心里。

——石钟山《幸福生活万年长》选自《小说月报》2003年第2期

“布什”转喻借代美国政府继而借代美国军队,“联合国”转喻借代“联合国安理会”;“头发很长的”借代女人进而借代“见识短”,出自俗语“头发长,见识短”,两例都是利用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关系,根据语境和交际需要,以点带面或以面代点激活相关的知识节点。

在会话含义的推导过程中,语境的作用不可小视,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合作理论所牵涉到的含义推导均属于纯语用层面,属含义推导的差错修复模式(error recovery model),而关联理论的推导则是一种在动态的语境中选择最具关联性意义选择模式(meaning selection model),但这些理论均忽视了人类的基本认知模式——转喻。与隐喻一样,转喻是我们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含义的推导过程是隐喻与转喻共同参与的过程。

## 5. 结语

无论传统修辞学还是现代认知语言学,都认为转喻关系是一种邻近的替代关系,但是,修辞学把这种替代定位在现实世界里的邻近,是现实事物名称之间的替代,而认知语言学则把这种邻近定位在概念层面,是语用者意义建构过程中的概念替代。Radden & Kövecses (1999)提出了转喻的三假说: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认知操作。Langacker (1993)认为转喻的实质在于心理上通过一个概念实体把握另一个概念实体。他把转喻理解为一个概念实体(即参照点)为另一个概念实体的把握提供心理通道的“参照点现象”便是这个道理。

转喻是一种认知机制,其本质是概念性的。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转喻的普遍性决定了其在语用推理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转喻是理解和生成话语的认知方式,更是一种语用策略,转喻语言具有经济性,可增加语境效果,增加语言的稠密度及其诗性效果,这些是转喻的语用功能,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将另文论述。

## 参考文献:

- [1] Croft, William & D. Alan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 Huang, Y. A Neo-Gricean Pragmatic Theory of Anaphora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1 (27): 301 - 35.
- [3]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4]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Langacker, Ronald W.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4): 1 - 38.
- [6] Levinson, Stephen C.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0.
- [7] Panther, K-U & L. Thornburg. On the Natur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A]. In: Panther, K-U & L. Thornburg (eds)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 - 20.
- [8] Papafraou, Anna. Figurative Language and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Distinction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6, 5(1): 179 - 93.
- [9] Radden, Günter & Kövecses, Zoltán.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7 - 59.
- [10]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 [J]. *当代语言学*, 1999 (1): 3 - 15.
- [12] 李勇忠 李春华. 框架转换与意义建构 [J]. *外语学刊*, 2004 (3): 24 - 29.
- [13] 李勇忠. 言语行为转喻与话语的深层连贯 [J]. *外语教学*, 2004 (3): 14 - 18.